

农村基督教信徒世俗人际关系的特征及成因

——基于湖南H镇的调查

胡叠泉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近年来,基督教信仰在农村社区得以迅速发展。湖南H镇也不例外。信仰基督教对H镇农村信徒的人际关系有双重影响:信教人群之间关系得到强化,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世俗的人际网络被削弱。在非基督教村民看来,农民基督教徒世俗的人际关系并没有得到改善,人际交往范围更加狭窄,交往动机仅仅是为传福音。基督教徒世俗人际关系欠佳的原因主要在于:教化生活导致的自我隔离,阻隔了其与非信徒的人际交往;基督教义与传统礼仪冲突所致的社会排斥与社会隔离致使其与普通村民的关系日益疏远。

关键词:农民;基督教信徒;农村社区;人际关系;湖南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0)05-0038-06

Effect of Christian faith on rural christianity disciple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Based on investigation of H town in Hunan province

HU Die-qu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zhou 550001,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ristian faith is rapidly developed in rural communities. In this manuscript, Christian relationships in rural communities is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using H town in Hunan province as a case. We find that Christian relationships are not improved very much due to cultural conflicts, more closer with other Christian, and more alienated with other villagers, which will result in bad effects to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countryside, and need to be lead correctly.

Key words: peasants; christianity disciples; rural communitie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Hunan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等几大宗教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复苏,其中尤以基督教发展最快。2003年,我国信奉基督教的人数已超过1 500万,其中80%左右的教徒生活在农村,开放的教堂有16 000余座,聚会点有32 000多个,其中新建的教堂占总数的70%,平均每天新增堂点6所^[1]。中国社科院最新发布的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0》显示,截止到2009年,基督教会已达55 000多个堂点,基督教徒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总数估计为2305万人。社会转型

时期民众信仰的变迁吸引着众多学者进行相关研究,产生了诸多成果:其一,以研究某一地区基督教发展状况及原因为主。如宫哲兵以湖北省随州市基督教为例,分析了基督教急剧发展的原因和存在的社会问题^[2]。闭伟宁以浙江省海宁县斜桥镇基督教发展状况为个案,从个体、宗教本身和社会环境三个不同方面分析了基督教迅猛发展的原因^[3]。其二,将农村基督教的迅猛发展放置于社会变迁的背景中来分析,关注宗教变迁的社会场域,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研究基督教传播实践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如李亦园探讨了20世纪40年代初河南洛阳偃师县一个村落中基督徒丧礼上的冲突,认为由于当时村中只有两家信基督教,冲突只涉及生命礼俗或特殊祭典,其社会结构仍是纯一的。并提出“近代中国文化的变迁可看作是异质化了的文化与统一的社会互相作用的表现”。^[4]黄剑波探

收稿日期: 2010-08-11

作者简介: 胡叠泉(1978—),女,湖南双峰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社会学。

讨了基督教在中国北方农村社区的进入方式及其本土化策略及其对乡村原有社会文化、社区群体结构及家庭关系的冲击和改造,特别讨论了作为外来信仰的基督教与其他本土信仰形式,尤其是其与伏羲信仰的关系^[5]。其三,研究农村基督教徒社区的人际关系。如王询通过对儒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在人际关系模式方面差异的比较,分析了这两种文化对世俗中人际关系的影响^[6]。刘海涛通过对河北商村和金村的调查,认为基督教信仰转变了群体的人际关系模式,信主的家庭关系和睦,基督教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村民关系,使村民关系得到协调。但基督教信仰与民间信仰存在着冲突^[7]。任映红认为,宗教的沟通交流功能可增进人际友爱。教堂是身心疲惫的村民休闲娱乐的场所^[8]。王思明、田雄也认为,信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民的生活圈子,促进了农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9]。以上文献对后来者从事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大多侧重于阐述基督教徒的人际关系状况,较少注意到农村基督教徒的双重身份。实际上,农村基督教徒既会用教徒身份和教友交往,维系教内人际关系;同时作为一个生活在乡村社会中的世俗人,离不开与非基督教村民之间的互动。这究竟会对农村基督教徒的人际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信教是否必然改善农村基督教徒的人际交往状况?对此,笔者拟以地处湘中腹地的双峰县H镇的农村基督教信徒为研究对象,探讨上述问题。

双峰县H镇为山区,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农户家庭收入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其次是外出打工收入。笔者选取该镇,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首先,宗教问题一直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如果想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的方法来研究,就要考虑到研究的进入方式。H镇是笔者的家乡,亲戚中有基督教信徒,这样通过亲戚的身份进入调查现场,不易破坏现场,不易暴露自己研究者的身份,可以收集到相对真实的调查资料。其次,农村基督教的发展不同于大城市,选择这样一个农村小镇作为研究地,可为中部省份农村信教农民的人际关系研究提供一个可供比较的实例。该镇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基督教迅速发展,教堂从原来的空白,发展到现在的5所,教徒从原来的30多人增加到1000多人。教徒性

别比例大致为男性占30%,女性占70%。此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相结合的方法:1)2008年7月,对H镇3个教堂附近的非基督教徒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抽取了3个村,共发放问卷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49份。问卷调查对象从性别结构来看,男性71人,占47.7%,女性78人,占52.3%;从年龄结构看,20岁以下的为5人,20-39岁的52人,40-59的为73人,60岁以上的为19人;从学历状况看,小学及以下为31人,占20.8%,初中67人,占45%,高中(含职高,中专)39人,占26.2%,大专及其以上12人,占8.1%。2)2008年7-10月对基督教徒采用个案访谈的方法,访谈对象有普通教徒(在教堂受过洗礼、并注册的和有基督教信仰但还没有注册的信徒)、教堂管理人员、传道老师。

二、农村基督教信徒世俗人际关系特征

按费孝通所说,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即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在农村,每一家都以自己作为中心,以自己的生活影响范围画出一个圈子,并根据各种标准编织起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在这张网上,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位置上,都是这张网上的一个结点,与周围的人的关系是稳定而明确的。在传统社会中,由于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高度一致性,人际关系的网络早已存在,但多限于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基础结成的宗族及乡党。这种人际关系网络在现代社会虽然有所变化,但主体部分依然存在。

在H镇,作为一种先赋性的关系,亲缘关系是信任结构建立的基础,也是村民获得实际资源的重要途径。所以在许多超乎个人、家庭能力之外的事情需要请人帮助或生活上发生困难需要求助的时候,大多数村民都将亲戚作为首选的对象。最基本的地缘关系共同体是邻里。因为,居住在同一地域的人们往往有着相似的兴趣,产生相同的习俗,由此形成相似的文化心理。在农村生活中,邻里是村

民们相互交往中的重要对象与活动范围,在日常生活和生产经营的过程中,村民都会经常与邻里打交道,特别是农闲季节,男人们都喜欢端着酒杯串门,边喝酒边聊天。女人们忙完了自己的事情也喜欢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家长里短的说个不停。而邻里之间照看老幼、互借生产工具、农忙时换工、婚嫁丧娶时互相帮忙等等都是常见的现象。

近年来随着基督教的迅猛发展,出于对精神信仰的共同追求,教徒们组成了一个以教会为核心的人际关系网络。这种以教会为核心的人际关系网络,对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业已产生一定的冲击。因为,信仰基督教使信徒跳出了原来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限制,形成了一种新的具有归属感的跨村落的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因为有共同的信仰,有定期的聚会,有经常的互助,结合更加的紧密。王铭铭认为,仪式过程中的礼物交换“是社会圈子和关系的强化和重构”。^[10]H镇基督礼拜堂信徒,不仅在宗教活动中“经由仪式的文化整合形成了对想象共同体的认同”^[11],而且还在日常生活交往过程中通过各种关系纽带将信徒纳入到个体家庭的人情网络中,将想象共同体从一种心智结构演变为日常生活的共同体实体。通过对教徒的访谈可以看出,H镇农村信徒的团队观念较强,信徒间彼此关爱也非常明显,若某位信徒家中出现事故或有困难,其他信徒会自发组织起来,给予无偿援助和关爱。最为常见的是,农忙时没有能力完成农田作业的信徒家庭往往在其他信徒无私的帮助下,提前完成农活作业,有些信徒甚至将自家的农活延后来献爱心、作奉献。农村信徒就是在通过日常的互助和人情往来不断强化着这一人际交往关系。

怀孕的宋女士:信徒心地都特别的善良。你看现在我怀孕吃的鸡蛋都是别人送的,有一户我还去过,家里挺困难的,老头瘫痪了,儿子精神不正常,家里也没喂几只鸡,但每次给我鸡蛋都是二三十个,我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没舍得吃鸡蛋,都留给我了。还有一次我说想吃冬瓜,家里没有,他们知道后你也送她也送,送来一屋子的冬瓜。

朱母:去年采茶的时候,因为家里人手少,就我一个人,茶又多,忙不过来,而茶不及时采一下子就老了,当时我非常着急,姊妹们得知这一情况,

叫了四五个人来,一个下午就帮我茶摘完了。

基督教在强化信教人群之间关系的同时,其以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人际网络却受到影响。据调查,农村基督教信教人群世俗(与不信仰基督教的村民之间)人际关系呈现以下特征:

1. 基督教徒的世俗人际交往范围更加狭窄

村民信仰基督教之后,由于信仰的改变,受教义的约束,他们很少与非基督教村民来往,而非基督教村民出于对基督教信仰的偏见,也不愿与教徒来往,这样就使得教徒的人际交往范围更加狭窄。问卷调查中,在回答“基督教信徒要与自己做朋友时的态度”时,41.6%的人选择拒绝跟基督徒做朋友,只有24.8%的人表示愿意跟基督徒交朋友,33.6%的人表示还要再考虑考虑。因为不同的信仰,平时接触的人不同,谈论的话题也不同,正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非基督教村民对跟基督教徒的交往意愿不是很强。这还从非基督教村民平时交往最多的人的调查中得到进一步证明。非基督教村民日常的交往对象绝大部分是不信教人群,在所调查的149人中,选平时与基督徒交往最多的只有一个,仅占调查总数的0.7%;而平时交往最多的都是不信教人群,占82.6%。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社区非基督教村民很少与基督徒来往,关系不是很密切,从另一角度说明信教以后农村基督教徒的交往范围变得更加狭窄。

2. 基督教徒世俗人际交往的动机主要是传教

基督教徒与村民交往时热衷的是宣讲神的恩典,给别人传福音。H镇的村庄绝大部分的村民都遇到过基督教徒向他们传福音的,偶尔遇到和经常遇到的共89人,约占总数的60%,而回答从没遇到过的只有60人,占40.3%。这说明基督教徒要么不和非基督教村民交往,和非基督教村民交往就是传福音。基督教是一个善于传福音的宗教,这也可能是它发展很快的一个原因。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传福音的机会,笔者就深有体会。在调查中,笔者接触了很多的基督教徒,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地要说服笔者信仰基督教。有一次,笔者和爱人带着孩子参加一个基督教的家庭聚会,他们先是从不同角度跟笔者灌输信仰基督教会如何如何好,如果信仰基督教,在主耶稣的庇佑下,将来会在事业上有更大

的成就，这还不算，后来他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还特意向主耶稣说现在笔者一家已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希望主耶稣能够感化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听着这些话，笔者就在沉思，主耶稣难道真的能感化我们这一对多年来受无神论教育的夫妻吗？

基督徒总是热衷于给别人传福音，非基督教村民对他们传福音的态度如何呢？调查数据显示，对基督徒传福音表示欢迎和比较欢迎的只有16人，仅10.7%；表示很反感和有点反感的有27人，占18.1%，而大部分都选择无所谓。据了解，这和农民的小农意识有关。基督徒在他们面前传福音，尽管喋喋不休令人心烦，但这不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因而大多持无所谓的态度。调查过程中，笔者进一步追问：“遇到基督徒向你传福音，如果你不同意他的观点，你会跟他反驳吗”，大部分的回答是：“我不想听可以走开啊！”

除了传福音，H镇基督徒还喜欢宣扬“末世论”，认为末世就要来到，只有信仰基督教的人才能得救，而不信仰基督教的人在灾难来临之时，会无一幸免。这种说法引起非基督教村民极大的反感和一致反驳：“还说什么基督徒心地善良，你信仰基督教我们没有来干涉你们，为什么你们还要反过来诅咒我们，从这点就可以看出信基督教的没有良心”。

由此看来，农村基督教徒的世俗人际关系并没有得到改善。基督教教义要求教徒要有一颗谦卑的心，“要爱你的邻居”，“爱你的仇敌”，“爱人如己”，这对信徒的文化水平、个人修养、道德品质等有很高的要求。由于农村教徒素质不高，加之他们信仰宗教大都是出于一种功利目的，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和行为并不如《圣经》所要求的那样，所以在非基督教徒的村民看来，村民信教以后并没有多少变化，人际关系也没有多少改变。从调查问卷可知，非基督教徒认为，基督徒信教以后比以前乐于助人的只有44人，占总人数的29.5%；认为没有什么改变的有97人，占65.1%；甚至还有村民认为他们比以前更不乐于助人，占5.4%。而在回答“基督徒和其他人相比，谁与别人闹不愉快更少”这一问题时，认为基督徒与别人闹不愉快更少的只有44人，仅占29.5%；认为信教与不信教的都一样的有24人，占

16.1%；认为不信教的与别人闹不愉快更少的有63人，占42.3%。这说明，在非基督教村民的眼中，基督教信徒信教以后人际关系并没有有所拓展，反而还不如非基督教村民。

这确实与基督教信徒的功利目的相关，正如费孝通所说：“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祀很像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鬼神在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12]”。笔者访谈到的周家老人就是这样一个实例：

“我原来是信佛教的，每年都组织唱戏，到南岳山烧香。每年都要花不少钱，但花了钱，费了心，家里还是不顺利。媳妇生了个儿子，是个死的。儿子跟别人打架，把膝盖给打碎了，出去打工呢，总赚不到钱。所以我就觉得信佛教没什么用。后来就有人跟我说，既然信佛教没用，为什么不改信基督教呢，我说原来信佛教的能信吗？他就告诉我不管原来信什么都可以信，只是信了之后就不能信别的了。我就想试试也可以，然后就跟着他们做礼拜。你还别说，信基督教后，家里还挺顺利的，一直平平安安的，儿子和媳妇出去打工都挺顺利的，能赚到钱。”

在农村很多村民都是像周家老人一样，因为文化水平不高、家庭收入低，抱着功利目的而信教。所以入教之后，他们很难把基督教教义内化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在日常生活当中虽然绝大部分的基督徒能够遵守教义，在道德上严于自律，但也有一小部分教徒不能用教义来约束自己，骂人，吵架，不孝敬公婆等行为比非基督教徒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是少数，却给基督徒的整体形象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也加深了群众对基督徒的反感。

三、农村基督教徒世俗人际关系疏离的成因

1. 教化生活导致的自我隔离

在H镇，“信教的”已经成为一个标签，对信徒而言，他们与世俗中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时时刻刻想到自己是神的子女，以基督教的教义来约束自己。信徒群体及个人在进行自己的行为选择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自己的行为不能违反诫命。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不会像世俗人

一样,一见面就家长里短的聊天,也不参加一些世俗的娱乐活动,因为这些在基督教徒看来都是违反诫命的。“我们一般不和外面的那些人(非信徒)聚在一起,也尽量避免和外面的人接触。你看我们(信徒)聚在一起可以读读圣经,说说神的恩典……外面的人有空就打牌,打麻将,这些事情我们是不做的。那你说我们弄在一块干什么,我说神的恩典她们不信,她们讲的那些法事(打牌,打麻将,信徒们一般避免讲这些东西,认为是对神的不敬)我们又不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话说。”笔者婶婶的嫂子是基督徒,但是她每次来妹妹村子从不住在自己的亲妹子家,而选择住在同村的一个基督教徒家里,笔者问她为什么不住在自己妹子家,她说虽然妹子是自己人,但信仰不同没有共同的话题。而住在教友家可以一起做祷告,唱赞美诗,说神的恩典,心情愉快。随着交往次数的减少,基督教徒与普通群众的关系自然越来越疏远。

教友之间每周一次的主日崇拜再加上一周几次的家庭聚会为他们直接而持续的交往提供了机会,也为基督徒的相互了解和感情交流设置了场景。而基督徒和自己的亲戚和邻居交往不一定如此频繁而有规律。根据社会心理学的有关研究,交往双方如果有较多的类似的地方,那么相互之间的吸引就容易产生,同时会促进人际关系的发展。共同的信仰促进了信徒间的交往,共同的追求使他们亲密相处。相似的年龄、经济状况、生活境遇和共同的信仰使他们有永不衰竭的谈话内容而彼此吸引,促进人际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在精神上也易于产生“我们都是上帝的子女”的群体意识。所以,由于信徒之间的这种自我隔离,他们慢慢远离了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而融入到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中。

2. 基督教义与传统礼仪冲突所致的社会排斥、社会隔离

基督教是外来文化,遵守的是圣经,而非基督教村民他们大部分沿袭的是祖宗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基督教宣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敬祖宗及其它神灵。信教以后要把祖宗牌位都拆掉,而中国传统文化则重敬天祭祖,并被视作天下之通义,决不能放弃。有人曾批驳基督教道:“彼教无君父之尊

亲,惟耶稣之是奉,是无纲纪也。无骨肉之亲爱,惟主教之是崇,是无伦常也。”调查发现,不信教的村民都对基督教的这一行为表示反感。在149个调查对象当中,有101个反对拆掉祖宗牌位,认为无所谓的42人,表示赞成的6人。可见,在中国农村祖先崇拜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基督教的这一反常举动必然会遭到世人的反对,虽然教徒拆掉自家的牌位,他们不会去过度的干涉,但是在他们眼中,基督徒的这一行为是大逆不道的。由于文化上的排斥与隔膜,普通群众就会对基督教徒祷告,作见证,唱灵歌等与众不同的行为表现出极端的不认同和偏见,认为他们有点神经不正常。有的村民把基督教的聚会点讽刺成是“俱乐部”。总之,在非基督村民看来,基督徒的行为都极其怪异。下面是笔者调查到的新媳妇对第一次见面的信基督教的婆婆的评价:

“我第一次来婆婆家,看到婆婆跪在十字架下,蒙着头,一边哭一边嘴里还念念有词,当时心里就想公婆是不是有点不正常,我这么大老远的嫁到湖南来,本来我妈就不同意,如果再摊上这么个神经病婆婆,那日子肯定不好过,心里盘算着,还是别嫁过来了。后来一问才知是信基督教的”。

基督教徒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聚会,传福音,或多或少地荒废了农业生产。而在村民看来土地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而荒废农业生产是他们最看不惯的,所以,村民偏激地认为,基督徒都不务正业。H镇某户信基督教的人家,因为经常参加教友聚会,热衷传福音,没空干农活,自家土地上庄稼与同村不信教的村民家相比,长势最差、杂草最多,村民总讥笑他:“主什么时候给你来除草啊!”

还有就是在人情等方面的冲突。在农村,人情作为人际关系的纽带是至关重要的。离开人情,就失去了使人们粘连在一起的基础,把人们“串”在一起的红线也将不复存在。村民总是围绕“人情”这一纽带不断地编织着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互欠人情使得人们相互之间走动频繁,从而有利于维持和增进相互之间的情谊,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在遇到困难时,与他人有人情来往的村民,可以向他人求助,得到他人的帮助,即人情具有“互助”的性质。村民普遍认为,“说不定哪天就需要找别人帮忙呢,平时要是不多走动走动,等到需要帮忙时再去找别人,那多不好意思啊!”

所以村民一般在别人家有喜事例如娶亲、盖房、生日等时一般都会去随礼。基督教信教人群由于经常出外做礼拜再加上和非基督教村民的交往意愿不是很强,所以他们往往错过亲戚和邻居的喜事,没有随礼。根据布劳的交换理论:参与交往的各方都期待着他人的回报,一旦他人停止了所期待的回报,这一交往关系便会中止^[13]。因此,随着基督教信教人群逐渐远离这一人情交往圈,他们势必日益遭受村民的排斥。

中年篾匠:他们信基督教的连亲戚都不要了,春节我们去我老婆的妹妹家拜年,他们一家是信主的,去了连饭都不留我们吃,说有事要出去,我还以为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原来是要去做礼拜。以后我都不想去他们家里,难道做礼拜比我们这些活人还重要吗?

曾女士:他们那些信教的天天混在一起,哪还记得我们这些邻居的事情啊,所以他们家里有什么事情我们也懒得去。

因此,有了这样一种文化礼仪和价值上的冲突,非基督教村民都不愿和基督教徒来往。交往的减少势必有意或无意地形成非基督教村民群体对基督教徒村民群体的孤立、隔离。“社会隔离的形成原因当然也与社会差别有关,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不同人群之间缺乏交往。现代社会的许多事实都可以证明,虽然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但社会交往的畅通会使不同群体之间相互有较多的理解和沟通,从而使社会差别淡化,有时能达到“互补”、“双赢”的效果。反之,如果缺乏社会交往,社会差别就会扩大,群体之间形成鸿沟,形成社会隔离。”^[14]反过来,社会隔离更加强化了基督教信徒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也更加彰显了其群体特征,使群体内交往增多,进而加剧基督教信徒的自我隔离。

总之,从基督教在H镇迅速发展的实践逻辑来看,基督教发展对农村人际关系的改善不能被给予过高的期待。因为,H镇农民的宗教信仰尚属浅层次信

仰,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宗教教义尚不能真正或完全内化到农民教徒心灵深处,成为约束农民个人行为或指导生活实践的规则,这其实也是农村基督教徒世俗的人际交往状况不佳的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基督教尚不能成为沟通农民心灵秩序和乡村社会秩序之间的一座稳定的桥梁。

参考文献:

- [1] 段琦.当代中国基督教概况及所面临的问题[J].世界宗教研究,2003(3):78.
- [2] 宫哲兵.随州市基督教的现状——宗教人类学田野考查[J].世界宗教研究,2001(1):65.
- [3] 3 闭伟宁.改革开放与基督教在我国沿海农村的变迁——基督教在斜桥镇发展状况调查与思考[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5):50.
- [4] 李亦园.宗教与神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5] 黄剑波.“四人堂纪事”——中国乡村基督教的人类学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3.
- [6] 王询.人际关系模式——儒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比较[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5):121.
- [7] 刘海涛.透视中国乡村基督教——河北乡村基督教的调查与思考[D].中央民族大学,2006.
- [8] 任映红.温州村落社区宗教文化及其影响[J].青海社会科学,2007(4):74.
- [9] 王思明,田雄.乡村基督教的实践形态:嵌入与疏离——以关中地区南村基督教会历史变迁为例[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91.
- [10] 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M].北京:三联书店,1997:150.
- [11]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叻人译.想象的共同体[M].上海:上海出版集团,2005:35.
- [12]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M].上海:三联书店,1985:110.
- [13] 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303.
- [14] 吕露光.从分异隔离走向和谐交往——城市社会交往研究[J].学术界,2005(3):36.

责任编辑:陈向科